

# 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鲜明特征

■ 谭颖熙

论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通过实践检验理论的正确性,从而推动理论创新。其次,自我革命精神强调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在党性教育和道德教育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道德情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道德引领还有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自我革命精神始终扎根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维护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为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艰苦卓绝地奋斗,始终将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我革命的核心要义,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的人民性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性高度契合,展现了党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实践能力。

党的性质和宗旨是自我革命精神人民性的根本依据和基本遵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郑重地宣告自己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坚定代表,在实际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这一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与群众紧密相连,让人民成为我们党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确保工作始终贴近群众需求,反映群众意愿。正是中国共产党坚守的人民立场,赋予了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底气,使我们党长久立于不败之地。

在党的历史发展与实践探索中,自我革命

精神的人民根基不断夯实巩固。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实现人民的幸福作为前进的方向,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走好群众路线,树牢群众观点,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深刻印证了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决定性力量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将满足人民的愿望和需求、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长期自我革命的动力。

**三、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科学性**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改造世界为目的,以客观规律为遵循。党的自我革命实质是党的自我扬弃和辩证否定,蕴含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指导思想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工具和行动指南,帮助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不断应对新的挑战,保持自身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其核心在于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动态变化中把握矛盾的对立统一,由此推动事物不断变化、变化和发展。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和坚强意志发现并承认党内客观

存在的矛盾问题,通过矛盾分析法认识问题的根源和症结所在,并在实践中刀刃向内、革旧除弊,着眼解决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取得了卓越成就。以新的理论指导自我革命新的实践,这一过程彰显了我们党追求真理、笃行真理的科学精神。

另一方面是实践经验的科学性。“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自我革命历程,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筑牢长期执政的坚实政治基石,更为新时代持续推进自我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科学实践经验,例如:完善的制度体系是保证自我革命长期稳定开展的前提条件;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是自我革命的思想条件;严密的组织体系是保障自我革命措施的执行更加协调高效的重要支撑等。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实践的检验和经验教训的总结,证明了自我革命是科学的、符合中国发展规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实践。

**四、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发展性**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发展性体现在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过程中。“守正”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前提和基础,“创新”则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源泉和路径,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过程中推动自我革命向前发展。

自我革命的守正,守的是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理想信念和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将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这一立场赋予了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底气,使我们党能够克服自身缺点,解决自身问题,修正自身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既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积极实践者。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因怀揣坚定的理想信念,英勇无畏,以热血铸就革命的胜利;在新时代,同样因坚守这份信仰,勇于自我革命,以行动捍卫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尽管当前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不断变化,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始终如一,那就是为实现人民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越是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放松懈怠,越要牢记党的初心使命,越要坚持自我革命。

自我革命的创新,就是要以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推动自我革命,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在新理念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根本遵循。这一思想蕴含着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的本质要求和内在逻辑,深化了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思路上,党坚持问题导向和问题导向,深入剖析和研判党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在新方法上,党通过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构建严密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地勘国企党建与业务双融双促工作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 周妍

地勘勘查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先行性产业,承担着为国家找矿突破、保障资源安全的重要使命。地勘国企在其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其运营发展不仅关乎企业自身的生存壮大,更影响着国家能源资源战略的实施。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也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然而,长期以来,部分地勘国企存在党建与业务“两张皮”现象,未能充分发挥党建工作对业务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党建与业务双融双促工作机制,成为地勘国企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地勘行业特点及其对党建的影响**  
工作环境特殊。地勘工作大多在野外进行,条件艰苦且地点分散,员工长期远离本部,这使得传统的集中学习、集中培训难以开展,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管理面临较大困难。例如,在一些偏远山区的勘探项目中,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传递不畅,导致党内学习活动的及时性和覆盖面受到限制。

项目周期长、流动性强。一个完整的地勘项目往往持续数年甚至十几年,期间涉及多个阶段和不同地域,人员组成也不断变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组织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持续发挥党建作用是一个挑战。而且频繁的人员流动可能导致党建工作衔接不畅,出现漏洞。

专业技术主导。地勘行业高度依赖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从业人员多为专业技术人员。这就要求党建工作必须紧密结合专业特点,找准切入点,否则容易被视为形式主义,无法得到技术人员的认可和支持。

**二、地勘国企党建工作的现状**  
多数地勘国企认识到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党组织架构,配备了专职党务工作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党建活动,如主题党日、党员志愿服务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党员意识和团队凝聚力。部分企业在重大项目负责人选拔任用注重考虑党员身份,发挥了党员骨干的带头作用。但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融合程度不高。虽然表面上重视党建,但实际上党建工作仍停留在表面功夫,与业务工作缺乏实质性关联;党建工作考核指标单一,未充分考虑业务发展的推动作用。二是创新性不足。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一些地勘国企党建工作方法陈旧,习惯于老套路,缺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党建工作方式的意识和方法。例如,线上党建平台建设滞后,不能满足野外工作人员随

时随地参与党建活动的需要。三是人才队伍建设薄弱。既懂党建又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匮乏,导致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之间的沟通协调不畅。一方面,党务工作者不熟悉业务流程和技术要点,难以将党建工作精准对接业务关键环节;另一方面,业务骨干对党建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参与积极性不高。

**三、地勘国企党建与业务双融双促工作机制**  
(一)政治建设为根本,把握正确发展方向  
强化理论武装,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建立常态化的学习机制,通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专题讲座等形式,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国资国企改革、自然资源管理等方面的重大论述。

发挥党委领导作用。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确保党委在企业重大事项决策中的前置研究和把关作用。对于涉及企业发展战略、重大项目投资、重要人事任免等重大问题,必须先由党委会议讨论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后再提交董事会或经理层决策。

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和管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建立健全舆情监测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意识形态问题。积极开展正面宣传引导,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

(二)思想建设为基础,筑牢共同奋斗思想根基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教育等活动契机,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艰苦奋斗精神教育。通过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观看警示教育片、举办演讲比赛等形式,让党员干部深刻感悟党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为企业奉献的决心。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将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提炼具有地勘特色的企业文化理念。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职工运动会、文艺汇演、技能竞赛等,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促进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关注员工的思想动态,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各级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基层一线,与员工谈心谈话,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及时化解矛盾纠纷。针对员工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疏导工作,理顺情绪,凝聚共识。

(三)组织建设为核心,打造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

优化党组织设置。根据企业组织结构和业务分布情况,合理设置党组织。对于跨地区、跨部门的项目团队,及时成立临时党支部或党小组,确保党建工作覆盖无死角。探索功能性党支部建设,按照科研项目组、生产单元流水线等设置党支部,使党组织更加贴近业务一线。

选优配强党组织带头人。选拔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同志担任党支部书记。加强对党支部书记的培训培养,定期举办培训班。推行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制度,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党支部书记给予表彰奖励,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严格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注重从业务骨干、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加强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监督,严格执行“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党员积分制管理等制度。运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党员信息管理系统,实时掌握党员动态。

(四)作风建设为重点,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密切联系群众。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走群众路线。领导干部要带头改进工作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建立健全联系服务群众长效机制,组织开展结对帮扶、走访慰问等活动,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精简会议文件,减少不必要的检查评比。改进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发有用的文。加大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的问责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曝光典型案,形成有力震慑。

加强廉洁从业教育。深入开展廉政教育活动,通过廉政党课、案例警示、廉政谈话等形式,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防范廉洁风险。

未来,随着国企改革不断深化和地勘行业的发展,党建与业务双融双促工作机制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希望更多的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关注这一领域,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不断完善相关理论和实践模式。同时,地勘国企自身也应持续探索创新,结合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地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为实现国家资源安全战略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一一四勘察院有限公司)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员农民衣着传播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认知

■ 王晓娜

党员农民衣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传播党关于农民问题理论认知的重要途径和符号展示。党员着农民衣着,固然是革命战争年代隐蔽自身的需求,也是发动群众、依靠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战略选择。党员农民衣着在形成、巩固工农联盟,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传播与实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确认识和解决农民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有关农民问题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农民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一重大论断,明确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现代无产阶级约200万人”,这意味着工业无产阶级只占当时总人口的0.4%,从侧面说明当时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占总人口的8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鲜明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工人阶级只有与农民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这一理论认知若要产生发动农民群众的切实效应,就必须涉及理论的传播与阐释。党员着农民衣着是党靠近、深入农民群众,面向社会传递其对农民问题认知的重要途径。

党员穿着的农民衣着样式与驻扎当地普通农民大众无异,具有简单、朴素、实用的特点。建党初期及至大革命时期,党员多以知识分子和工人为主,农村党员较少,党员多穿着当地农民群众的乡土装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员着农民衣着成为主流,粗布对襟褂、扎脚长裤、布鞋、草鞋、斗笠、草帽成为日常穿着,如贺龙在湘西开展斗争时常穿湘西农民的典型装束“粗布对襟衣”;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党员着改良农民衣着,会在粗布褂上佩戴“抗大”“八路军”等标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党员多着粗布中山装,国统区地下党员仍着农民衣着开展斗争活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员为什么倾向穿着农民衣着?其中涉及三方面的因素:生存策略、发动群众的需求、依靠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符号展示。其一,党员着农民衣着是隐蔽精干的生存策略。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党员在农村活动时穿着同农民衣着无异的农民着装,能够更彻底地融入农村环境,便于其隐蔽身份,也能拉近其与农民群众的距离,取得群众的信任,更依靠农民大众的力量隐蔽自身。同时,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革命战争年代,党员的农民着装也是党践行艰苦奋斗作风的真实写照,是党保存力量的生存策略。其二,党员着农民衣着是发动农民群众的战略需求。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无论是农村社会调查,还是开展农民运动,都需要对农民大众的情感治理策略。服装具有明显的视觉刺激,在视觉感知,党员着农民衣着更直接地给农民群众以亲近和信任,增强同农民大众的情感联结,能够更为容易地深入农民群众的生活,了解农民大众的生活状态、思想状况,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动群众的目标。其三,党员着农民衣着是党依靠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符号展示。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开展革命。这时,党员的农民衣着就凸显其所具有的宣传党的理论和策略的符号意义:农民群众通过党员的着装更切身感受到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也通过跟农民群众的深入接触更加具象地感受到农民群众强烈的“阶级压迫”,更加感受到农民群众迫切的革命诉求,为党制定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提供了实践基础和动力力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员农民衣着

在阐释、传播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认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使农民确定阶级身份认同以分清敌友、践行‘官民平等’‘军民平等’以瓦解封建不平等依附关系、夯实党的思想建设以强化意识形态基础、推动服装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以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的先河”等方面。其一,党员农民衣着促进农民了解自己的阶级身份并确定“被压迫阶级”的身份认同。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即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同志留下了一身补丁的历史形象,党员干部穿着同农民群众一模一样的“补丁摞补丁”的短打褂、扎脚长裤,这同地主阶级的绫罗绸缎、长衫马褂形成鲜明对比,向农民群众展示阶级压迫的最直接视觉体现,农民大众通过服装这一视觉符号自动代入自身“受压迫阶级”的阶级身份和属性,明了党将“地主阶级”作为革命对象的缘由,愿意主动参与到“打倒地主阶级”的革命活动中。其二,党员农民衣着展示了党的“官民平等”“军民平等”的革命策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队伍中,党员干部和普通士兵、普通农民群众穿着同样的粗布衣裳,直观地向农民群众展示“官民平等”“军民平等”的革命理念,这与地主阶级统治之下,达官贵人穿“高档丝绸”,而平民庶人只穿“布衣”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平等意识”的产生使得农民大众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促使其对封建宗族关系和土地雇佣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而毫无顾忌地加入斗争,参与土地运动和革命斗争。土地革命平瓦解了农村传统社会秩序,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其三,党员农民衣着夯实了党的思想建设的基础。自党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党员的思想建设,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员的成分多为农民,就更凸显了当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倡导、鼓励党员穿着农民衣着是对农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方式。朴素破旧的农民衣着向农民党员和非党员农民大众展示党的阶级立场,配合当时诸如苦学运动、广播报纸等宣传手段,加上给农民土地等物质利益的满足,已成为党员的农民更加坚定自己的政治选择、积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非党员普通农民大众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实现了党和广大农民群众在精神和意识形态上的联通。其四,党员农民衣着同土地革命、农民生活改善、中国化理论等实践等一起,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和实践,服装成为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重要媒介。在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传播、阐释的过程中,服装服饰成为重要依托路径之一,如改革开放新时期,胡耀邦同志就带头穿西装,传播党的改革开放的信念与信心,及至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时常在重要场合穿着新中式服装,表明对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重视和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强调。概而言之,服装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党农民问题的理论认知和实际解决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媒介作用,充当了党的创新理论传播、阐释的重要符号。

毛泽东同志曾语重心长地说:“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可见,毛泽东同志对“农民力量”的清晰认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员农民衣着向党员干部、普通党员、党外农民群众阐释、传播着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认知。党员着农民衣着既是党员隐蔽自己的生存策略,也是发动群众、依靠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符号展示。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开展革命。这时,党员的农民衣着就凸显其所具有的宣传党的理论和策略的符号意义:农民群众通过党员的着装更切身感受到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也通过跟农民群众的深入接触更加具象地感受到农民群众强烈的“阶级压迫”,更加感受到农民群众迫切的革命诉求,为党制定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提供了实践基础和动力力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员农民衣着

在建设专项基金”支持(项目编号: BIFTCG202509);是北京服装学院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一般项目“两个结合”视域下高校“大思政”生态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DJ202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单位:北京服装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技术批判思想 及其对当代人工智能治理的实践启迪

■ 石泽平

当今世界,人工智能浪潮澎湃,从“无人工厂”的机械臂到生成式AI的文本创作,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生产与生活。效率提升与社会繁荣的前景令人振奋,但与此同时,就业结构的剧变、劳动价值的争议乃至人之为主体的困境,也如影随形。在这一历史性交汇点上,重温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技术与资本的深刻洞察,恰似获得一盏穿透迷雾的明灯。其批判性思想不仅帮助我们厘清人工智能的本质,更为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驾驭这项革命性技术、确保其服务于人民福祉,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指引与实践启迪。

**一、穿透“智能”幻象:人工智能的劳动价值论本质**

面对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AI令人惊叹的产出,一种观点认为技术的“奇点”已至,机器将替代甚至超越人类创造力。然而,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我们能看到更为深刻的本质。

人工智能,无论其形态如何先进,究其根本,仍然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将机器视为“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今天的人工智能系统,无非是人类智慧在数字时代以算法、数据和算力为载体的最新结晶。它由人类设计、训练和驱动,其“智能”是人类集体知识(“一般智力”)的凝聚与再现。因此,人工智能本质上是生产工具,是不变资本的高级形态,而非独立的价值创造主体。

这一判断,直接回应了“机器创造价值”的迷思。根据劳动价值论,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是人类的劳动。生产资料,包括最先进的AI系统,在生产过程中只转移其自身内含的既往劳

动价值(即“死劳动”),而不创造新价值。AI惊人的生产效率,源自它作为工具对人类劳动生产力的极大增强,但价值的增值归根结底源于与之结合的、驾驭和使用它的人类劳动。即便是看似“无人”的智能工厂,其背后依然离不开研发、维护、监控和战略决策的依然鲜活的人类。这正是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在当代依然鲜活的证明。

**二、资本的逻辑与异化的风险: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的困境**  
技术的社会影响取决于其所嵌入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机器在资本主义下既是提高生产力的手段,更是资本榨取剩余价值、强化劳动控制的工具。同时,必须通过民主监督,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算法建立备案、审计与问责机制,防止“算法黑箱”加剧社会不公。

在资本驱动下,AI首先可能加剧“劳动困境”。虽然它能解放重复劳动,但资本的逐利性往往导向大规模替代而非补充人力,引发结构性失业与“岗位极化”,这正是“机器排挤工人”在智能时代的新表现。

更深层的风险在于技术异化与人的主体性危机。当AI系统应用于招聘、考评与监控时,劳动者可能沦为被算法支配的客体。平台经济中,用户的数字劳动被无偿用于训练AI,形成新型“隐性剥削”;资本借由垄断数据与算法加剧社会不平等。同时,AI在某些领域的卓越表现催生了“无产阶级无用论”,冲击劳动尊严。这一切表明,若放任AI受资本逻辑主导,技术非但不能解放人,反而可能成为奴役人的新形式。

**三、走向解放的路径:社会主义人工智能治理的探索**

人工智能的治理方向,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社会观。他批判的是技术资本主义应用,而非科技本身;其理想在于使技术成为缩短工时,增

加自由、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杠杆。这为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治理指明了根本原则:让技术服务于人类,而非资本的增值。具体路径如下。

一是构建“人机协同”新范式。发展目标应从“机器替代人”转向“机器赋能人”。政策需引导AI承担重复、枯燥、危险任务,将人类劳动解放出来,投向更具创造性的领域。这就要求建立全面的终身学习与技能重塑体系,帮助劳动者适应并主导未来,将技术挑战转化为人的发展机遇。

二是推动生产要素公有化与民主化治理。数据与算法是关键生产要素。应探索建立公共数据平台,在保障个人权利前提下促进数据的社会化利用。同时,必须通过算法透明与民主监督,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算法建立备案、审计与问责机制,防止“算法黑箱”加剧社会不公。

三是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分配与伦理规约。AI创造的生产力红利应由社会共享。可通过“数据税”“算力税”等调节手段,将部分超额利润用于再培训、社会保障和弥合数字鸿沟,助力共同富裕。伦理上,必须将“以人为本”嵌入AI全流程,通过立法与标准确保技术不侵犯人的尊严与权利,始终服务于社会整体福祉。

人工智能浪潮的航向可被塑造。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历久弥新,它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引导AI突破资本逻辑的束缚,使其真正成为激发人类潜能、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工具。这不仅技术的未来,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基金项目:2025年宁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技术批判思想及其对当代人工智能治理的实践启迪》(项目编号:CXXM2025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